

# 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纪念李达同志100周年诞辰

雍 涛

李达同志是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他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李达同志10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缅怀李达同志的生平事迹,学习他热情宣传、忠贞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对于我们深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推动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 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思潮的先驱

李达同志早年留学日本。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勤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留学期间,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格尔曼·果特著)、《马克思经济学说》(考茨基著)、《社会问题总览》(高崑素之著)等三本书,由国内出版,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筹备和出席“一大”,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嗣后,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办人民出版社,很快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他还撰写和发表了许多论文,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第四国际“左”倾思潮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特别是他在1921年4月撰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sup>①</sup>一文,尖锐地批驳了梁启超认为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有力地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当时年仅30岁的李达同志毅然选定了论敌中梁启超这个庞然大物作为批判的对象,表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从三个方面回击了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一是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谬论,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

同”而改变，它同样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二是批驳了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将来”再谈社会主义的胡说，指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他说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实业，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还是社会主义的方法。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开发实业”，只能使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奴隶，一遇生产过剩，还要“招来失业的痛苦”。同时“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的战场”，产业万分幼稚，又处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压迫之下，妄想发展资本主义，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不免是空想罢了”，所谓“将来”再谈社会主义，也只是虚伪的欺骗而已。三是揭露了“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假社会主义本质，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完全撤废”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个现社会的“万恶的根源”，而改良的社会政策即假社会主义，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企图“劝诱”资本家“宽待劳动者”，只能使劳动者永远“呻吟于资本家的掠夺支配之下”，而不思反抗。从而还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本来面目。

看看当年李达同志对梁启超的批判，想想今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谬论，如什么社会主义“早产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再搞三百年殖民地论”等等，我们不难了解，这些论调不过是半个多世纪前反社会主义思潮的翻版而已。我们应当学习李达同志的革命批判精神和科学的论战态度，深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

## 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对革命力量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李达同志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始终坚守马列主义阵地。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迫害、毒打，一面在北平、上海、桂林等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讲坛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被誉为“红色教授”，另一面撰写和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专著，为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他和雷仲坚翻译出版了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很有影响的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等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就反复读过，从头到尾都作了批注、圈点和勾划，并写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语。②他撰写的《经济学大纲》，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毛泽东同志也读过多遍，并向延安理论界推荐过。1935年作为讲义刊印、1937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影响尤为深远。

《社会学大纲》一书，不应仅仅看作是一般的哲学教科书，而应看作是献给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和其他爱国志士的精神武器。作者在第一版扉页上写着：“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在第四版序中作者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③毛泽东同志对此书十分赞赏。他在延安收到李达同志的书后，曾写信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认为十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本书是很难得的，并称李达同志是“真正的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把《社会

学大纲》读了10遍，写了许多批注。他还向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此书，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1961年8月，他在庐山会见李达同志时，又重提《社会学大纲》的影响和意义，并建议修订再版。

《社会学大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成果的集大成，其体系之严谨，内容之深刻，超过了当时在我国已翻译出版的包括苏联、日本在内的所有同类著作。它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以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是当时中国人唯一可以与外国学者的同类著作相媲美的著作，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举例而言，该书既坚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和核心的思想，又全面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与《矛盾论》的观点相一致，为毛泽东同志所称赞。在阐述认识发展过程时，李达同志概括出认识发展的“圆运动”公式，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指出认识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也不是直线前进，而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为毛泽东对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概括提供了佐证。这一公式还表达了认识中介的思想，特别是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需要借助“媒介的具体”的提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即是说，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的哲学，它是不能直接回到或应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哲学和实践之间，需要有“媒介的具体”作中介。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防止哲学应用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在阐述历史唯物论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时，该书不仅说明了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准确地说明了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指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看来，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的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重温李达同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深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问题，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有助于防止片面性。

### 为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最后一息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在担任高等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同时，仍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1950年12月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同志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光辉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撰写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等重要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紧接着又写了《〈实践论〉解说》一书。1952年4月，《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同志又立即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在写作过程中，他为了同严重的胃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上办公室或在家里写作，身边总是放着两个袋子：一个装饼干，一个装热水瓶。他用少吃多餐的办法来克服胃痛，支撑那虚弱的身体，以保证写作任务的完成。为了使《解说》准确起见，李达同志每写完一部分，即打印出来寄给毛泽东同志审正。毛泽东同志收到后立即认真阅读并亲笔修改。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同志回信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④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

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sup>⑤</sup>

李达同志的“两论”解说，是五十年代中国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成果，是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解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取分段解释的形式，通俗地介绍原著。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很少了解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形式，帮助读者学习“两论”，是有好处的。当然，“解说”不应是通俗宣传的唯一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弄得不好容易束缚思想，变成“注经”式的东西。但李达同志的《解说》并不是“注经”式的，而是既忠实原著又有创造性发挥的独立著作，它帮助成千上万的不懂哲学的干部和群众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力求全面地准确地解释和发挥毛泽东哲学思想。李达同志的解说，并不拘泥于原著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更不是后来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而是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例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同志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李达同志的《解说》时，肯定了他的观点。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同志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又如，毛泽东同志对李达同志的《解说》曾作了几处修改，李达同志十分重视并加以采纳，但在文字上又作了认真地推敲，增删了一些关键的字句，使之更为准确。毛泽东同志修改《解说》的一段话是：“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李达同志则再改为：“当时还不知道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大资本家及其政府，他们是帝国主义者，但另一方面要争取外国人民。”<sup>⑥</sup>显然，后一段文字更为准确，更加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即已指出：“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sup>⑦</sup>李达同志的修改与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两论”解说还对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论述。李达同志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总结，是中国革命行动的理论”。这些论述抓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本质特征。《实践论》重新发表以后，有人问李达同志：怎样理解《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里所说的发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实践论》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向，并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做了系统的严密的分析和独立的光辉的补充，所以说《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在这里，所谓发展，是意味着它的延长、继续和补充，而这种延长、继续和补充，又必定符合于实践。”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理解，而是专在《实践论》中寻章摘句，或者企图发现哪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没有的东西，那显然是钻牛角尖的方法。在谈到如何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时，李达同志指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要结合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学习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总结我国革命和世界劳动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

建设的经验，同时还要吸取科学上的新发明和新成就，借以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之不断向前发展。

所有这些论述和“两论”解说本身所作出的榜样，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动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认真阅读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论著，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运用到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中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1958年李达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大跃进就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就会变成人民空社。”从1961年8月开始，他着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基本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已出版的该书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毛泽东同志对它的主要贡献，紧密联系思想战线的实际，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从方法论上论述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该书十分注意系统性和科学性，注意现实性和历史感，但又不赶热闹，不随风倒，其基本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李达同志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他就同林彪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达同志反对林彪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学语录、背警句、走捷径的谬论，指出：“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1966年3月，林彪鼓吹的“顶峰论”进一步泛滥起来，李达同志坚决抵制。他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决不会停滞不前，决不会有什么顶峰。他多次对人讲：“是顶峰？难道不发展了吗？”“这种提法太绝对化了，是形而上学，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讲的。李达同志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知道，我不同意。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是谁讲的，都不能同意。”这些话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由此他遭到林彪极“左”路线的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

李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生。我们纪念李达同志，要学习他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新的胜利。

注释：

- ① 见《李达文集》第一卷。
- ②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 ③ 见《李达文集》第二卷。
- ④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87页。
- ⑥ 见《〈实践论〉解说》
- ⑦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02页。

（本文责任编辑 郑传寅）